

故鄉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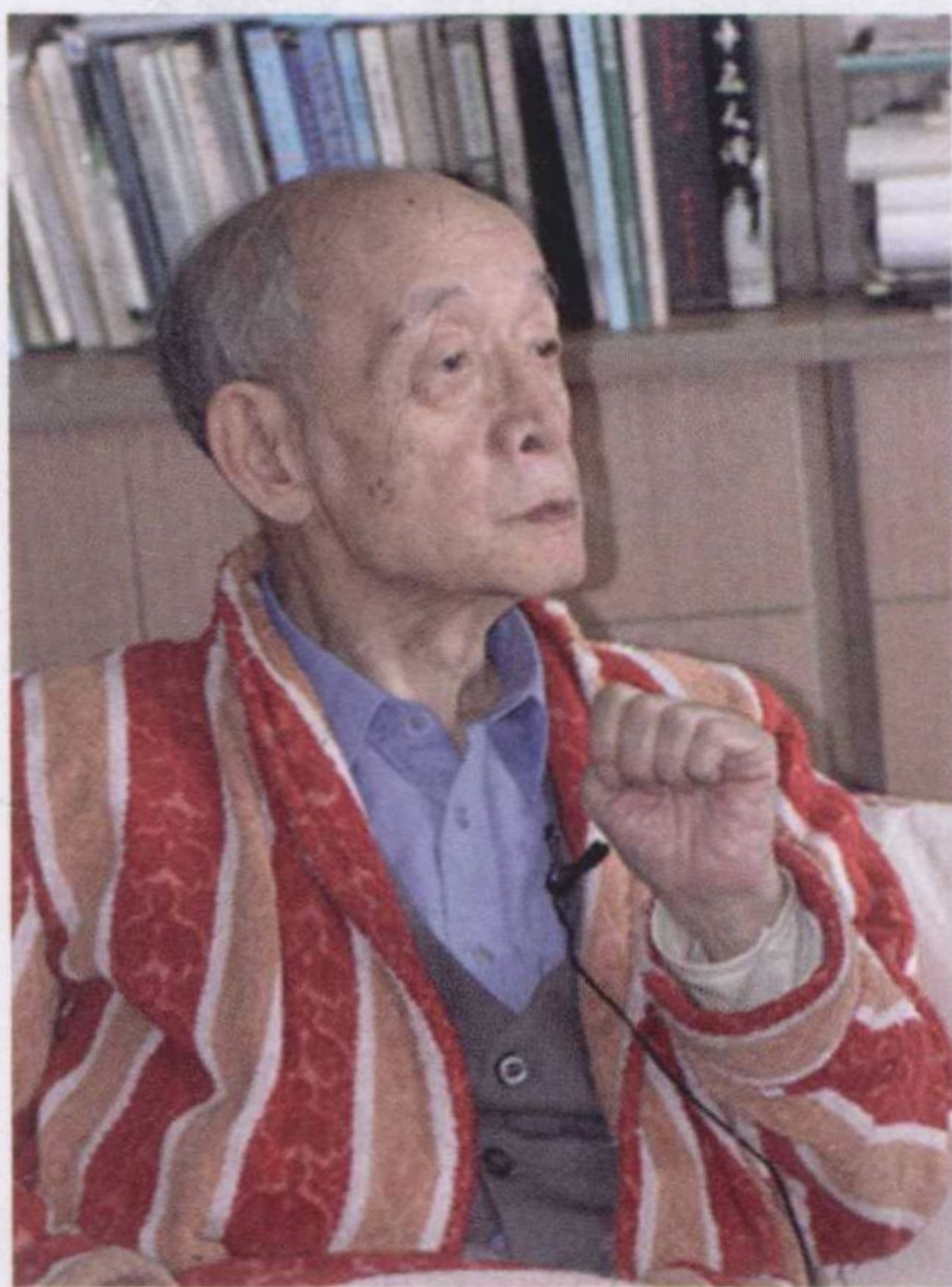


陈桥驿其人其事

88岁高龄的陈桥驿教授，被誉为“当代郦学领域的学术泰斗”，不久前，刚刚荣获浙江大学“竺可桢奖”。庚寅仲夏，我为考证“诸暨是绍兴以前的越国古都”，在诸暨学人陈侃章兄的陪同下，来到杭州拜访了浙江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

陈桥驿先生从事学术活动60余年，先后出版各类著作逾70种，公开发表的著述累计1000余万字。在水经注研究方面硕果累累，有《水经注研究》《郦道元评传》《水经注校释》《水经注校证》等问世，成为当代郦学领域的学术泰斗，为我国历史地理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985年，在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3位前辈大师的推荐下，陈桥驿出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成为继谭其骧等前辈之后当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领军人物。

鹤发童颜的陈教授，在他宽敞的书房里接待我们。我对陈教授说：“30多年前，我在《诸暨史志》上知道了你的大名。你在刊物上发表的大量古越文化的文章，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一直想找机会聆听你的高见，但终因诸事忙碌，无缘相见。”听说我在考证“诸暨是绍兴以前的越国古都”问题，陈教授马上接口说他的祖上也在诸暨，故对诸暨历史文化作过深入的研究。他说，越国古都确实在诸暨北面的埤中，有大量史料可以作证。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浙江水》引据《吴越春秋》云：



陈桥驿先生

“越王都埤中，在诸暨。”他还特别强调勾践的“勾”应写为“句”字。

陈桥驿教授认为：古代越南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影响，被大大地低估了。广东简称粤，粤与越，读音相近。越南及东南亚等地都受越文化影响。越人以船舟为工具，随着水的灵动流畅，到达四面八方，将古越文化带往天涯海北，在那里生树开花结果。这同《越绝书·记地传》记载相符：越人“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夏王朝自大禹开创以来，经历103年时间，遭后羿、寒浞二氏40年内乱，中央政权在东南地区的势力大为减弱。夏王朝中兴之主少康在消灭内乱以后，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重振夏王朝

在该地区的力量，于“癸卯，六十有一岁，封庶子无余於越”（《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2），以祭祀大禹的名义，建立越国，以巩固夏王朝在东南地区的统治。

陈桥驿说，诸暨是越国古都，尔后由句践迁都绍兴。无余建立越国时，距大禹治水只有100多年，会稽山以北大部分地区海拔都在4米左右。在第三次海侵时，如同余姚河姆渡的古村落一样都还淹没在波涛之下，是一片浅海。而诸暨浦阳江沿岸的河谷平原海拔都在10-20米，均处于海平面之上。因此在4000多年以前，於越部落只能选择海平面以上地势较高的地区，作为他们生存的家园。为祭祀大禹的方便，无余选择会稽山以南的诸暨埤中作为居所。

陈桥驿教授侃侃而谈，时而引经据典、时而讲述故事、时而倾吐见解。他渊博的学识让人钦佩，他对“诸暨是绍兴以前的越国古都”说法的肯定，让我的考

漢東先生
蹴得見面
陳橋驛
言言七十一

陈桥驿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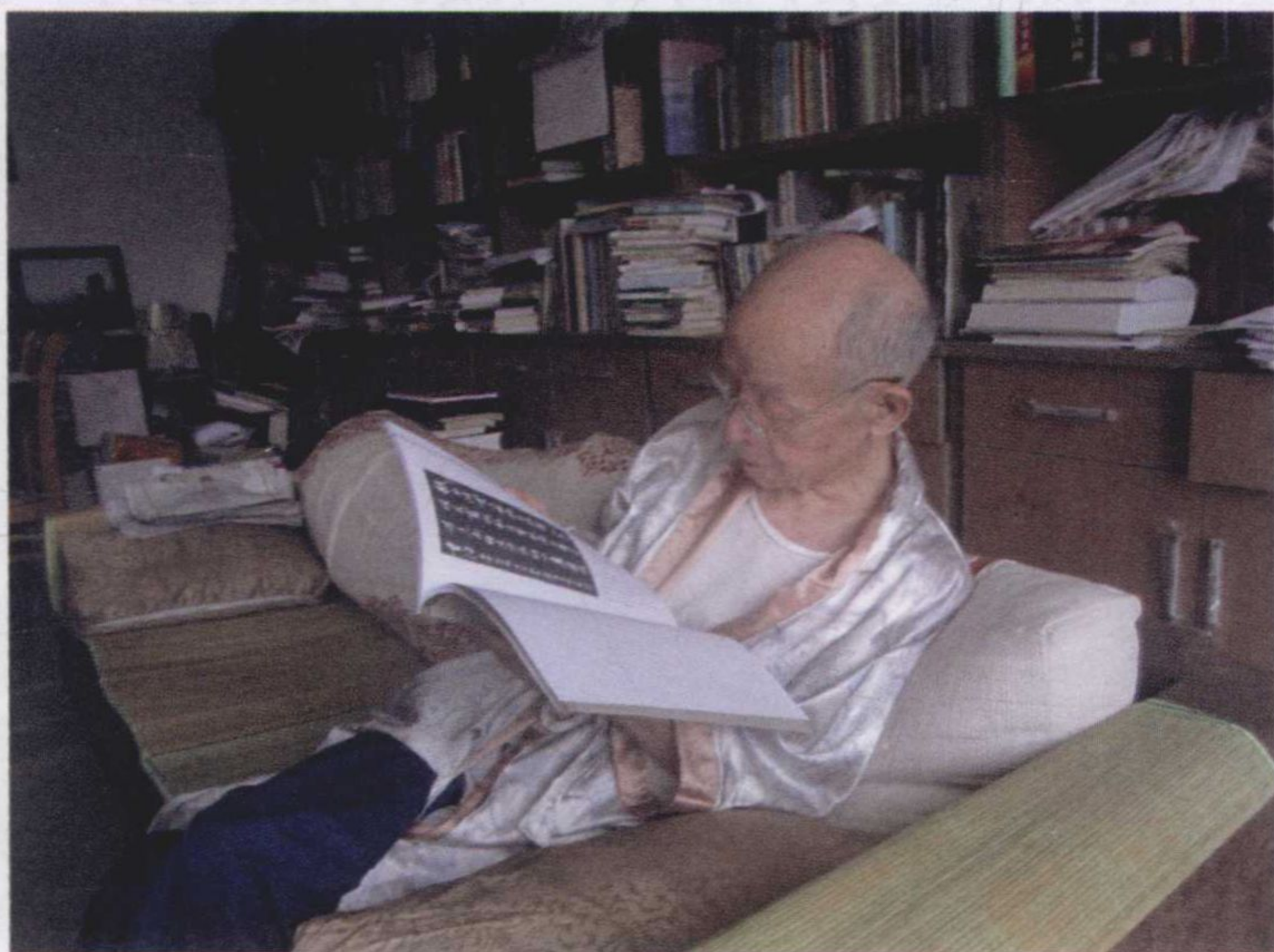
证有了强有力的支撑。

陈桥驿从小聪慧，5岁时便有“神童”之称，自古都有神童早夭之说，而陈教授却健康长寿。有时不得不佩服“上帝”之公平，他历经磨难，被打成“右派”，吃尽苦头，仍执着地研究《水经注》这部天下奇书，故天惜才矣。陈教授说：“我出生于1923年，记得5岁那年，祖父教我念的第一首诗是‘松下问童子’。我很快就背熟全诗，父母听了很高兴。不久，父亲教我念一首诗‘少小离家老大回’。第二天，我把父亲教的这首诗背给了祖父听，祖父不高兴了，他把父亲叫来，说：‘教阿均（陈桥驿的小名）的事由我负责，用不着你管。’后来我才知道，他的意思是念唐诗要从五言诗开始，父亲教我的是七言诗，祖父认为这打乱了他的教育计划。祖父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陈教授潜心研究《水经注》已有半个多世纪。他在《论水经注的版本》《水经注版本余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水经注》的版本发展承袭关系，对各版本的特点、价值、缺陷进行了评价。他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的地理学观点、方法研究《水经注》。

“陈教授怎么会与《水经注》结缘的？”我很想了解陈教授是如何走上郦学研究之路的。

陈教授说：“在孙辈中，祖父最看得上我，直接指导我的教育。那时，我们家住的房屋叫‘状元台门’，在绍兴很有名，是明代绍兴的状元张元忬的府第，大概是在清朝嘉庆年间卖给我们陈家的。童年时代，在状元台门内的大天井中，晚饭之后，



陈桥驿翻阅作者书写的字帖

听祖父讲故事。祖父指着我家北面一座山说：‘这叫府山。春秋时期，越王句践杀了有功的大臣文种，就把他埋在这座山上，所以这座山也叫种山。’然后，就开讲句践和文种的故事。我是在祖父引导下，走上了研究《水经注》的正道的，祖父提议我应该读哪些版本的书籍。那时，我记录有关《水经注》的读书笔记十几本，卡片有几千张。20世纪60年代，《水经注》研究开始有成果，发表了一篇《水经注的地理学资料与地理学方法》的论文。在‘文革’中，我也没有放弃对《水经注》的研究，不过当时我为《水经注》包了一个红色外套，外观就像是一本红宝书。”

“文革”抄家时，陈先生精心摘录的数千张卡片和长期积累的资料全被红卫兵抄走。庆幸的是他的几十本记录《水经注》研究成果的笔记“漏网”没被抄走。造反派发现后以5天为期限，令其按时交出。如何保住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唯一的办法是抄！陈桥驿发动全家分头抄录！1968年6月下旬，沉沉夜色中暑气逼人，陈家所有门窗全用棉被、床单遮得严严实实，黑布蒙起的灯罩下，陈桥驿夫妇和两个女儿、大儿子五人在伏案挥汗抄录，刚上小学的小儿子则担当起门口放哨的任务。五个通宵苦战，数十万字的笔记终于留下，成为陈教授研究学问的无价之宝。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陈桥驿教授感慨地说。

陈教授也是性情中人，一谈便不可收。考虑到陈教授年事已高、工作繁忙，原计划约谈半个小时，想不到一个半小时很快过去了。于是我们起身告辞，他热情地陪同我们参观他的起居室和藏书处。他还特意为我题写“汉东先生，难得见面。陈桥驿 2010年7月11日”作为纪念。一个大学问家如此和蔼可亲，令人感动，有机会与这样的学问家交谈是最美好的事情。

2010年9月3日于无闲斋

注：陈桥驿先生是我敬仰的乡贤，此文发表后收入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8月出版的《名人印象》一书。此书曾寄赠陈桥驿先生雅正。陈先生给我来电，表示谢意，并要求我再寄两本给他，赠予绍兴市陈桥驿故居博物馆展出。

何占豪与“梁祝”

去年冬天，我应邀参加龙泉建县 1500 周年庆典活动，会前广播里一直播放着旋律舒缓优雅的《龙泉之歌》。这首由何占豪先生谱曲的歌，在龙泉耳熟能详、家喻户晓。龙泉人告诉我，现在龙泉广播电视每天早中晚开播前夕都会放《龙泉之歌》。

四年前，我的朋友叶放写了一首热情洋溢的诗——《龙泉之歌》，经颇有文才的市委书记赵建林精心修改后，希望我能找一个音乐家为这首诗谱曲。我说可以试试，《梁祝》主创何占豪是我的同乡，他对江南水乡有特殊的感觉。回沪后，我把龙泉人的愿望告诉了何占豪，并恳请他能帮一下忙。何占豪爽快地一口答应。于是每天早上，龙泉人听着《龙泉之歌》走到田头，走向工厂和机关；每天傍晚，和着《龙泉之歌》的优美旋律，龙泉人回到温暖的家……

我与何占豪很早就相识了。每年春节前夕诸暨市领导来沪团拜时，我们就有机会谋面。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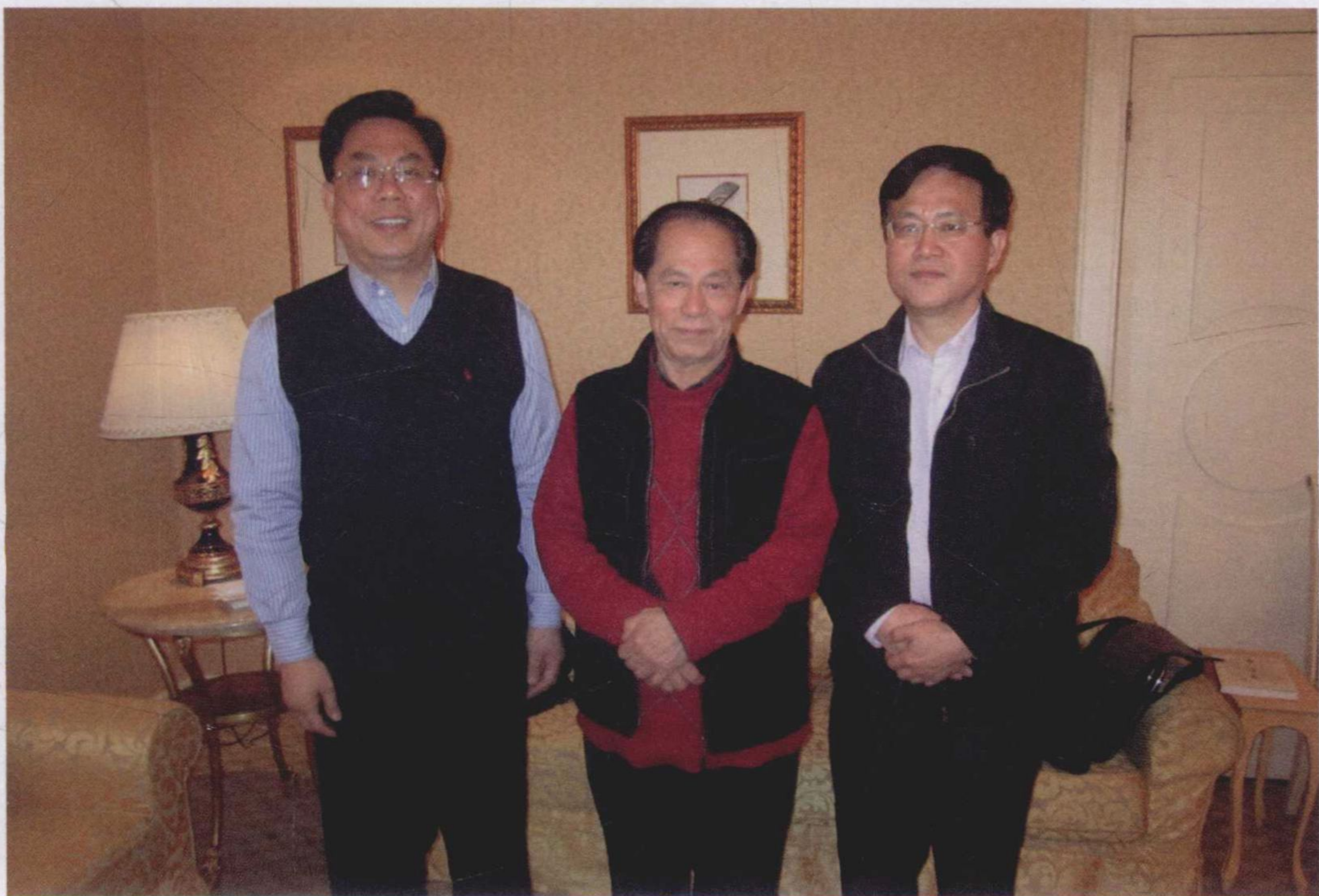


何占豪向大同中学校长盛雅萍解说《大同之歌》曲谱

年前，我专程到何府拜访，与何先生谈“梁祝”，话乡情，交谈甚欢。“我的家乡算是音乐之乡，晚上听姑妈们唱歌，父辈们唱越剧，唱绍剧。就这样，从小受戏曲音乐和现代音乐两方面的耳濡目染，逐渐地走上了音乐道路。”何占豪的话道出了诸暨乡土音乐积淀的深厚，除了何占豪，那里还出了像钱惠丽这样的越剧明星，绝非偶然。幼年时，我常回家乡诸暨省亲，逢年过节，祠堂演社戏的壮观场景，至今历历在目。我想，正是家乡的生活环境给了何占豪创作《梁祝》的灵感吧！

78岁的何占豪，谈笑风生、神采飞扬。他说，早年曾在浙江省越剧团乐队工作，后入上海音乐学院进修班学习小提琴，有机会探索小提琴作品创作和演奏上的民族风格问题。创作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真是机缘。他说，在那个时代大背景下，大家都上山下乡，我们下乡采风时就问老百姓你们爱听什么。老百姓听不懂外国古典音乐，喜欢听越剧和沪剧。于是我就拿越剧调子来编曲。那时候越剧最红的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白蛇传》。我就准备编《梁山伯与祝英台》小提琴的四重奏，叫《梁祝四重奏》。其实用越剧的音调来作曲还是农民的主意。我一直强调，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中国戏曲界、音乐界几代人的劳动成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过分炫耀个人的作用，不但要受到前辈们无声的指责，也会给后代留下笑柄。

随着《梁祝》乐曲知名度的提高，何占豪、陈钢、俞丽拿三位当年凭着参与《梁祝》创作和演奏而一举成名的小青年，越来越被人们所看重，知名度也越来越高。谈到这个问题，何占豪特别强调说，时任上音管弦系长笛教师并兼任系党支部书记刘品，对《梁祝》协奏曲的诞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在农村艺术实践时，深感学非所用的苦恼，是刘品首先提出‘小提琴必须民族化’的设想。这使我们这些拉琴的年轻人感觉有了方向。他发现我在小提琴上演奏的《二泉映月》很有民族风格，当知道我又在用越剧音调写弦乐四重奏《梁祝》时，建议成立‘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并将我作为‘小提琴民族化’的骨干力量，担任实验小组的组长。其实，实际工作计划、理论探讨等活动，都是在他领导下进行的。《梁祝》协奏曲的题材确定后，我一度产生了畏难情绪，觉得自己是个业余作者，怎么能接受这么重大的任务呢？看出我的情绪变化，刘品对症下药地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他认为我有条件为小提琴民族化多作贡献，不要过分迷信作曲大师们的天才，要看到自己‘满肚子民间音乐’的优势。他说：‘你不要以为贝多芬、莫扎特头脑里



作者与何占豪（中）、钱振华（左）

的音乐是天生的，他们的音乐也是从民间音乐中提炼出来的。’正是他的这句话，解开了我思想中的疙瘩，才使我有勇气投入《梁祝》协奏曲的创作中去。”

何占豪说，关于《梁祝》爱情主题创作的灵感，来自越剧尹派创始人尹桂芳唱腔中的一句表达爱情的吟腔。越剧《红楼梦》中贾宝玉的一声“妹妹呀”和《盘夫索夫》中王玉林深情的呼唤“娘子呀”，是最典型的表达人物感情、也是越剧观众最痴迷的有代表性的尹派吟腔，这使《梁祝》整个主旋律既有江南风格又有越剧韵味。

《梁祝》的另一位作曲者为陈钢。那天，何占豪还与我谈及他与陈钢的合作关系。他说，我以前和陈钢并不认识，但当我知道他爸爸是作曲家陈歌辛时，一下子就有了亲近感。20世纪50年代初，陈歌辛到杭州浙江越剧团来体验生活时，曾热情地辅导过我，我还用小提琴试奏过一段他写的旋律。所以每次到他家去合作《梁祝》，见到陈钢的妈妈和妹妹就感到非常地亲切。我们两人的合作也出乎寻常得融洽，我们在专业上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我的民间音乐底子较厚，擅长写旋律，对小提琴的性能比较熟悉。陈钢对曲式结构、和声配器等作曲专业知

识的掌握较全面，有相当好的钢琴基础。他的长处正是我的短处，我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说得确切一些，当时我们两个都是尚未全面掌握作曲知识的青年学生，根本谈不上是作曲家。在统一构思下，以小提琴为主的段落由我先写旋律，用提琴演奏给陈钢听，他提出意见或建议，我当场修改或回去考虑，直到二人都满意为止；接着由陈钢配上钢琴伴奏，再到丁院长那里去上课。陈钢在乐曲的每个组成部分中的曲式结构，考虑得比较细致。

“外来形式民族化，民族音乐现代化”，这是何占豪音乐创作的座右铭。他说，在他4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前20年主要是以“外来形式民族化”为主，1959年与陈钢合作《梁祝》蜚声乐坛、誉满中外后，他的弦乐四重奏《烈士日记》、弦乐与合唱《决不忘记过去》、交响诗《龙华塔》等大型器乐、声乐作品相继问世，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注重戏剧性、抒情性外，还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

乡音未改的何占豪先生，具有诸暨人的热情、耿直和坦诚的性格特质，与他交谈，浓浓的家乡味让我倍感亲切。离开他家时，他执意亲自送到弄堂口，待我上车后，仍伫立一旁挥手送行，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1年香港电台举办的一次民意测验：“千年最受听众欢迎的十部经典音乐作品评选”揭晓，除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古典乐坛上家喻户晓的伟大作曲家的作品外，《梁祝》亦在其中。更有意思的是，颁奖会上其余九部伟大作品的作曲家均已作古，唯独《梁祝》作曲之一的何占豪高高地站在台上。一部《梁祝》为中国人赢得了骄傲，也为东方音乐赢得声誉。

有一位学者感叹道：“哪里有中国人，哪里就有《梁祝》！”人生取得这样的成就、达到这样的境界，是何等的荣耀！但何占豪称自己只是一个“探索者”，探索是他生命的永恒主题，只要人民大众喜欢，他会一如既往地奉献。

2011年3月2日



何占豪亲自指挥大同学子演奏《大同之歌》

附：

何占豪与大同百年校庆

2012年11月16日，大同之声——百年校庆音乐会，在上海音乐厅隆重举行。选择在庄重典雅、音色和谐的艺术殿堂上海音乐厅举办大同之声——百年校庆音乐会，体现了大同人的品位和追求，这符合百年名校的历史承载和文化品质。

上海音乐厅建于1930年，建筑风格属于上海地区少见的欧洲传统风格，在东亚享有盛名。我年轻时常怀着仰慕之情去那里欣赏音乐演唱会，接受文化艺术的洗礼。2003年因配合延安路高架的拓宽建设，上海音乐厅整体向南移动了66.46米才得以保护下来，当时我万分惊叹房屋可以整体移动而完好无损，心想什么时候再去移位后的上海音乐厅听美妙的音乐。但随着上海大剧院等一大批文化设施的建成，以及各种事务缠身，后来我竟然一次都未去过上海音乐厅，实在是愧于斯矣。大同百年校庆之际，盛雅萍校长邀请我与《梁祝》主创者何占豪教授共同参加音乐会，这使我有机会

重新踏进当年盛极一时的艺术殿堂。

大同中学百年校庆音乐会精彩纷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同学子艺术天分之高，文化素养之好，让人刮目相看。在整个演出过程中，台下学子个个聚精会神、专注投入，全都沉浸在艺术的欣赏之中。百年名校，名不虚传，学校的精、气、神由此可见一斑。

一所中学，同时拥有民族乐团、交响乐团、合唱团、舞蹈团，这在国内实属罕见。一台2个小时的节目演出，无论是开场戏民乐《龙腾虎跃》，舞蹈《铃鼓舞》，还是交响乐《黄河大合唱》，学生们的表演都达到一定的水准，有的堪称专业。交响乐《梁祝》是何占豪、陈钢的成名之作，当主持人介绍何占豪也在现场时，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何占豪起身挥手向师生致谢。学子当着何占豪的面，从容不迫地演奏起《梁祝》来，那音乐时而凄婉，时而激越，时而舒展，时而悠扬，让人沉浸在音乐创造的意境中。此时坐在我身边的何占豪，用手挥动着大同之声节目单，与台上演奏接拍，兴奋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音乐会压轴戏为著名音乐家王永吉指挥的《大同之歌》，台下嘉宾、师生起立放声齐唱。悠扬而激昂的旋律，唱出了大同人对昨天历史的自豪与自信，唱出了大同

大同中学校长盛雅萍向何占豪先生致谢



人对明天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校长盛雅萍创作的《大同之歌》，是大同百年校庆的亮点，我看后提议请何占豪来为《大同之歌》谱曲，以使《大同之歌》常唱不衰，激励学生奋进。让何先生谱曲再好没有了，但一个大名鼎鼎的教授会答应给一所中学的校歌谱曲吗？学校的顾虑在情理之中。但对此，我却有着十分的把握：何占豪和我是浙江诸暨老乡，他对我的为人处世、学术研究都比较认同，我对他的艺术成就也是赞赏有加，我在去年出版的《名人印象》一书中，对他的艺术成就作过专门描写。我们相处十分投缘，属于忘年交。当我向何先生提出我的想法时，年届八旬的何先生一口答应，并在短时间内谱写了激越的乐章：上阕体现了自豪庄重，名校为国家培养这么多的栋梁之才，实属不易；下阕彰显了大同人锐意进取，与时俱进，再铸辉煌的奋进精神。

盛雅萍女士信步走上舞台，隆重地请出何占豪，并授予何先生大同中学荣誉校友称号。何先生在接受荣誉校友称号时作即席答词，他说：“今天大同学子的演出很成功，朝气蓬勃，生龙活虎，充满活力。”尔后，何先生应盛雅萍校长之邀，亲自指挥由他谱曲的《大同之歌》，整时会场气氛达到了高潮。何先生的指挥从容不迫，热情奔放，威武雄壮，手势优雅而有力，清晰的拍点，一下子抓住舞台上的表演者和台下听众的情绪，他还不时转身指挥台下观众放歌高唱，这种群情激昂、热烈沸腾的景象，深深地感染在场的每一位观众，也将永远铭记在学生的心里。这就是艺术的力量。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此刻，何占豪已然成为师生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的，他成全了大同，也成全了自己。由此，我对何先生又有了新的认识，他胸中燃烧着一把火，再加上他对自己作品的深刻理解，他能把台上台下所有人的巨大的潜能调动出来，取得音乐艺术追求的最佳效果，获得出乎意料的巨大成功。

音乐会结束后，我们来到贵宾休息室，满面红光的何先生接受电视记者的采访后，走进更衣室脱下早已被汗水浸透的背心。仅仅只是指挥了一首校歌，竟然大汗淋漓，可见他是多么的投入。这倒是应验了一句老话，成功者必须付出辛劳与汗水。

晚宴上，我们遇到了德国小提琴演奏家沃尔夫冈·谢勒先生，这次他带了德国奥格斯堡玛丽亚斯坦中学乐队来祝贺大同百年华诞。他们在音乐会上演奏了热情奔放的吉普赛音乐，同样获得热烈的掌声。在交谈时，当他得知何占豪先生是《梁祝》的主创者时，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下跪致意，并说道，《梁祝》不仅是中华民族最为经典的作品，也是世界文化艺术的经典之一。这让何占豪大为感动，在场嘉宾也大为惊讶。这是大同之声音乐会的花絮了。

2012年11月17日于无闲斋

田野考古学者朱伯谦

前不久，从阿联酋的阿布扎比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浙江龙泉青瓷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这是中国瓷器第一次进入世界非遗名录，龙泉人尤其感到欣喜和自豪。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浙江著名田野考古学者朱伯谦说：“青瓷可以说是中国瓷器的始祖，而浙江龙泉窑则是中国青瓷史也是中华陶瓷史上的一个名窑。”因此，龙泉青瓷进“名录”是众望所归。



朱伯谦（中）陪同作者考察金华婺州窑

朱伯谦先生 50 余年来，考察发现的浙江省各地窑址数以千计。他曾数十次去龙泉窑遗址考察，著作《龙泉窑青瓷》是海内外公认的解读龙泉瓷的权威著作。粉碎“四人帮”后，我国出版了《中国陶瓷》一书，朱先生是此书的主要作者。

朱先生是浙江诸暨人，年过八旬，乡音无改，依旧是诸暨人的脾性——爽直和乐观。我和朱先生是同乡，曾多次去杭州朱先生府上拜访。6 年前，朱先生来沪上光临寒舍聊叙，听说我打算到家乡诸暨考察，朱老马上转变话题，与我专门谈了浙江古窑遗址的状况。他对我说：“你正在写《寻访中华名窑》一书，诸暨有不少春秋战国古窑遗址值得关注，当年发掘时我去考察过，那里出土的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残片，质量都不错，年代这么早的窑址在国内并不多，它在中国陶器发展史上有独特的地位。”朱老的一席话，引起我对诸暨春秋战国窑址的关注。后来我特地去诸暨春秋战国窑址考察，拙作中诸暨陶瓷文化占有一定篇幅，朱先生看后大加赞赏。

受朱先生影响，我对龙泉青瓷情有独钟，曾先后七次去龙泉大窑遗址考察。龙泉青瓷以粉青和梅子青为代表。粉青釉光泽淡雅柔和，可与碧玉媲美；梅子青丰盈滋润，既像雨水淋过的青梅，又仿佛蓝天映照下的清澈湖水。但令我遗憾的是，中国制瓷业如此发达，可文献资料却少得可怜，这给后人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如宋代文献资料中龙泉青瓷记载不多，文人骚客也很少提及，难道是美轮美奂的南宋官窑的盛名掩盖了龙泉青瓷的光辉？

当我向朱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时，朱老给出了答案。他认为，宋廷南迁，临安成为南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浙江人口大增，外销活跃，瓷业得到空前的发展。从遗址发掘来看，龙泉大窑可能设有官窑。窑工们根据南宋官窑制瓷工艺，将胎釉配方作了调整，创造性地生产了白胎厚釉青瓷，犹如翡翠碧玉，同时釉层光滑整洁不开片，深得宫廷和官僚的喜爱。这种白胎厚釉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南宋六陵墓地均有大量出土。由于我国士大夫文人对手工瓷业往往不屑一顾，文献记录较少，完全可以理解。

朱老说，龙泉青瓷能够恢复生产，还要感谢外国人。这是怎么回事？原来，20 世纪 50 年代，一些外宾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些人喜欢中国瓷器，他们向当时外交部的外事人员打听哪里有买“雪拉同”，外事人员不知何为“雪拉同”？就

说没有。后来，有位苏联援华专家在回国前也提出要“雪拉同”，大家就重视了。但仍不知“雪拉同”为何物，专家便拿出一个茶杯说，就是这类东西。外事人员说是瓷器啊，我们有著名的景德镇、唐山瓷器。于是拿出最好的给专家看，专家看后直摇头，连说“NO、NO”。为此事，外事人员专程到故宫陶瓷博物馆请教陈万里。陈万里是青瓷专家，《浙江与瓷器》就是他写的。这位被周恩来总理亲点而调进故宫博物院的著名考古学家，与龙泉青瓷有着不解之缘，就是他八上龙泉，找到了龙泉青瓷窑遗址。外事人员问“雪拉同”是什么东西？陈万里笑着告诉他们“雪拉同”就是中国青瓷。明代随着郑和下西洋的船只，龙泉青瓷“漂”到了欧洲，在巴黎，人们被它青翠典雅的釉色所陶醉，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词语来形容这它美丽的釉色。而法国当时正上演小说家杜尔夫的《牧羊女亚司泰来》，剧情描写牧羊人雪拉同和牧羊女亚司泰来的爱情故事。雪拉同出场时穿一件非常漂亮的青色衣裳，人们认为只有舞台上雪拉同那件衣裳的颜色，才能与龙泉青瓷的釉色匹敌。“雪拉同”便成为龙泉青瓷的代名词。一个富有诗意的名称，一个美丽的故事，吸引了多少人的关注眼光。

朱伯谦告诉我，“雪拉同”的趣闻逸事还惊动了周总理，1957年，他指示“要恢复五大名窑生产，首先要恢复龙泉窑和河南汝窑”。恢复龙泉窑，文物部门首先要搞清楚龙泉窑的历史；其次要能提供龙泉青瓷的标本，以便作研究参考。当时，浙江文物管理委员会就派朱伯谦前往龙泉调查，并进行考古发掘。于是，朱伯谦等一批考古研究人员，担负起了调查和考古发掘的任务。在龙泉大窑、金村调查时，朱先生他们发现龙泉窑有500多个古代的窑址，一条龙窑，长度有80多米长，

2米宽，烧一个窑就有几万件青瓷，这说明古代龙泉青瓷的生产规模相当大、产量非常高。在发掘过程中，朱先生他们还找到了一些瓷器标本。后来发掘报告发表在刊物上，朱先生撰写出版了《龙泉青瓷研究》



作者与朱伯谦

一书，在当时引起轰动。

2007年元月，相隔4年后，我重访浙南龙泉窑。车，在曲折的山道上颠簸，让人感到受不了。龙泉到处是崇山峻岭，当年日寇都无法侵入，而陈万里、朱伯谦等人翻山越岭亲临龙泉实地考察，遭受的艰难可想而知。在他们精神的感召下，我考察了国内22个省市自治区的50座古窑遗址，并撰写了《寻访中华名窑》一书。此番来到龙泉，触景生情，想到“文革”中陈万里被迫害致死，尸骨无存，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在龙泉为陈万里建亭竖像立碑，以表彰他为中国田野考古作出的巨大贡献。回沪后，我第一个电话打给浙江省考古所的前辈朱伯谦，朱老说：“坚决支持，功德无量。”他还带头捐款3000元，以实际行动支持我的创意，让我倍受鼓舞。如今铜像与石碑已耸立在大窑村口，为表达对陈万里这位先贤的敬意，我还撰文并书写了碑文。

多年来，朱伯谦传授给我很多专业知识。如鉴赏龙泉窑器物要把握它的时代特征：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婺州窑影响，器物特征与越窑、婺州窑比较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稍薄。北宋中晚期是龙泉窑发展的重要时期，胎体仍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以生活用具为主，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南宋龙泉窑进入鼎盛时期——唐和五代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零，而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青瓷釉色之美达到顶峰。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器物造型粗壮高大，胎体变厚而釉色减薄，观赏价值大大降低。为获得元统治者喜爱和促进销售，匠师们一般采用刻、划、印、贴、雕和点褐彩等工艺来美化器物。朱老将几十年积累的宝贵鉴赏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后人，可见朱老对事业的热爱，以及他的为人和高风亮节的品质。

如今，年事已高的朱老对陶瓷界的事情依旧关注、关心。拙作《日照香炉》出版，他写序加以鼓励；今年春天赵月汀举办百壶展，他欣然答应来沪参加研讨会，届时还将即席发言。他希望年轻人多多努力，将中华古陶瓷研究不断引向深入，让中华文明代代相传。

2009年11月8日

附：

朱伯谦先生贺信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我高兴地得知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市作家协会、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为钱汉东先生的著作《寻访中华名窑》举行创作研讨会，这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因年事已高、身体欠佳，无法亲临盛会，特修书一封，以示祝贺。

上海作家钱汉东写这部《寻访中华名窑》，历时四年，行程20万里，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结果，非常辛苦，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在中国考古界、古陶瓷收藏界引起了较大反响。《寻访中华名窑》这部书我已仔细阅读，图文并茂，考证严谨，受益匪浅，我从中获得不少信息，令人难忘。我完全同意已故中国古陶瓷学会会长汪庆正先生在序言里的评价：“他立足于学术，着眼于大众，紧扣于人文，注重知识性、科学性、可读性，视野比较开阔，不少作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采用轻松活泼的文风，娓娓道来，情趣盎然，这对于普及陶瓷知识，传承陶瓷文化，实在是一件好事。”

我曾陪同钱汉东先生考察浙江老虎洞官窑遗址、金华婺州窑等遗址，亲眼见到他爬山涉水、实地考察的情景。他虚心好学，不耻下问，总要把事情搞清楚为止，表现了一个学者的执着精神，文章发表后又及时寄来听取专家的意见，所以这部书出版后，在中国古陶瓷的研究者中反响积极，认为这对传播陶瓷文化，功德无量。我也欢迎有更多的作家、记者朋友来关心支持文博事业，共同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

朱伯谦 

2006年1月3日

同乡前辈张煦棠先生

沪上被我称之为“同乡前辈”的仅张煦棠先生一人。他是浙江诸暨牌头人，我是诸暨江藻人。很久以来，我一直想写写我的这位同乡前辈，但提起笔来总觉得可以写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一时不知从何处落笔。去年张煦棠先生八十华诞初度，我事后才得知，心里觉得很愧疚。每与张先生谈及此事，他总笑道：“你是大忙人，自己还要著书立说，就免了。”

张煦棠先生是共和国第一代记者，上海新闻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他从记者开始，一步一个脚印，一直写到高级记者，成为《文汇报》副总编，《新闻报》总编。他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仍然坚持写作的老记者。我的书架上赫然排列着他的著作《一个记者的足迹》《一个记者的手记》《怎样写新闻通讯》等，每天走进书房，他的这些书总在默默地注视我，无声地督促我。我的很多文章就是在张先生的影响下写出来的。

我认识张先生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故乡争论西施归属，请我找几位记者去家乡采访，我找到了他。他说，组织采访可能不行。事后，他还是请作家黄裳去诸暨写了一篇大文章。他的坦诚给我留下了最初的印象。1986年，家乡重建西施殿，除了征集到大量民间木石构件外，也陆续征集到了一批著名书画家的珍品，家乡人拟请海上名家刘海粟题写“西施殿”三个字。当时，海老正在香港，张先生出面向刘海粟请求。如今，刘海粟那遒劲有力的“西施殿”三个字，已被做成仿金大字，



张煦棠先生近影



作者与张煦棠（中）、陈侃章

悬于西施殿正方。

张先生是我进入新闻界的引路人。1992年，我改行从事新闻工作，他说，《文汇报》人才多，你来《文汇报》要捂掉的，还是到《劳动报》去发挥作用吧。随即写信并打电话给当时《劳动报》总编张德宝，把我推荐给他。尔后，顾行伟出任《劳动报》总编，他志在进取，让我担任总编办主任。

初到新闻单位，碰到种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我求助于张先生，他总是有求必应、献计献策，满腔热忱地支持我的工作。

从我当上记者起，张先生同我谈得最多的，就是记者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他说，在新闻记者的眼里，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假如记者没有激情，那么他就写不出好的报道。《文汇报》的朋友告诉我，张先生工作起来干劲十足，又充满激情，大家管他叫“张激动”。对此，张先生不以为然。他说假使一个人没有激情，不会激动，那么他就不配做记者。对好事不激动，见坏事不激愤，冷漠无情，那你赶快干别的事情去。记者的核心价值就是社会责任心、正义感。张先生的这些话是他在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中总结出来的，可谓字字珠玑。

1949年7月，年满20岁的张煦棠，满怀着青年人的梦想，考入了杭州新闻学校。第二年5月，他到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24军《火线报》任见习记者。从此，他踏上了记者这条路。第一次采访给他留下一生难忘的记忆。进入部队，他访问的第一个人是一位师政委，师政委对记者特别尊重，见到他讲：“噢，军报记者来了，我现在向军报记者汇报情况。”师政委的话，让张先生一下子感到肩上的担子很沉。很重，人家越是尊重记者，说明记者的工作越是重要。

1954年，张煦棠从部队转业到上海《文汇报》。“干一行，专一行，爱一行”，是张先生信奉的格言。日前，《文汇报》创刊70周年，他在“笔会”上撰写纪念文章，表达了他对《文汇报》深情厚谊。在4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他担任过军事、政法、经济、科技、文教等条线的记者，采写了数百万字的消息、通讯、特写、

评论和报告文学，并多次荣获上海新闻奖和中国新闻奖等。

张先生始终认为，跨进报社门槛的人首先应当好一名记者，无论你今后是做编辑，还是当总编。1993年中国新闻代表团一行到日本采访，作为副团长的他，在14天的时间里，写了17篇稿子，洋洋几万字。团里来自全国各大城市的记者，没有一个超过他的，那年他已是65岁高龄。一个始终把工作当作使命的人，他的视野永远开阔、他的激情永远澎湃、他的思维永远活跃、他的心态永远年轻。

在张先生的影响下，我自进入报社后，就以饱满的热情投入新闻采访第一线。在采访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余纯顺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我得知徒步中华大地8年的余纯顺，在即将完成他的走遍中华的伟大创举的时候，突然在罗布泊遇难时，我非常悲痛，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与余纯顺的交往一幕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决定要把我所了解的余纯顺写出来。于是，通宵达旦，我一口气写了长达7000余字的报告文学《走向远天的底下——追忆好友余纯顺》，文章发表后被17家报刊转载。

后来我调到出版社工作，尽管我已不做记者了，但我仍然对事物保持敏感。一次我在上海听说志丹苑可能有元代水闸出土，这将使上海历史改写，我非常兴奋，始终关注这件事。从参加开掘典礼一直到石闸出土，我先后9次到实地采访，参与考证。元代石闸整体出土时，我彻夜未眠、激情澎湃，一口气为《新民晚报》写了消息、通讯和特写三篇文章。第二天一早我把稿子交给金福安总编，当日发表，引起轰动，当晚数千人前往观看。其中刊发在报纸头版头条的消息，荣获了上海市新闻奖。去年元代水闸还被评为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我想，如果不是张先生的言传身教，也许这些文章不会这么快与读者见面。

1998年我主编《应用文写作大全》，请张先生写序，想不到才过数日，我便收到他写的长达2500余字的序言，这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这里，我抄录两段：“我的台子上摆着钱汉东主编的《古诗文导读大全》《人物描写大全》《情景描写大全》三本著作，120万字，出版日期是从1995年12月到1996年6月。半年时间，三本‘大全’问世，我不能不由衷地叹服钱汉东同志著述之丰，更感佩他勤奋笔耕，孜孜以求的精神。日前听说，经过昼夜奋战，又一部几十万字的《应用文写作大全》已编纂脱稿。同是天涯爬格人，个中甘苦我等知，对钱汉东我又有了深一层的了解。”



张煦棠先生和玄孙女

“认识钱汉东快近20年了，他是《文汇报》的作者，很热心的作者，那时他已是上海教育界中学语文教师的新秀了，曾经担任上海市青年教师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编写中学语文教材，对语文教学是颇有研究的。前此为中学生编著的三本‘大全’，足见他的功底之深，资料积累之多，

是难能可贵的。我同钱汉东的交往倒是在成了同行以后频率增强的。我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欢迎他加入新闻工作的队伍中来的，当时曾直言相告：‘你到报社工作，要有从头学起的思想准备，会写点新闻报道不难，要写出点名堂来就不容易了，好在你写作基础好，相信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记者。’果然如此，钱汉东到了《劳动报》很快就进入角色。他负责《劳动报》‘月末版’的编辑出版，从参与策划到自己采写重点报道，在报界‘周末’、‘月末’、‘星期刊’林立的态势下，《劳动报》的‘月末版’以品位高、立意正、角度新、时效强而独树一帜，深受读者欢迎，更获新闻界的好评，伊然里手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喜闻出版不久的《古诗文导读大全》，半年再版三次，印数逾十万，可见读者欢迎的程度了。相信《应用文写作大全》的问世，定能得到更多读者的喜欢。一个人能够为社会为祖国的灿烂文化增添光彩，是值得引以自豪和令人欣羡的啊，是为序。”张先生在字里行间，饱含热情，对我作如此充分的肯定，让我坐卧不安、诚惶诚恐。我以此作为奋斗的目标和动力。

前不久，小女初嫁，希望有长者为其主婚。我思考再三，恭请张先生担当此任。他十分高兴，说此生第一次受此荣任。那天他声情并茂、光彩动人的证婚词，感动了所有出席婚礼的嘉宾，也永远铭刻在女儿女婿的心中。

如今张先生虽已年至耄耋，但他的心依然年轻。他说：“动，就是生命；动，就是活力。总编辑可以不当，记者不能不做。记者是世界上一切职业中使人年轻的职业。记者永远年轻。”张煦棠先生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年轻的记者。

2008年1月26日

钱惠丽与韩非子

上周六，我从诸暨老家归来，途中收到钱惠丽发来的短信：“今晚《韩非子》在逸夫舞台合成，你能来关心小妹一下么？惠丽。”其实我对戏剧素无研究，平时连电视剧也懒得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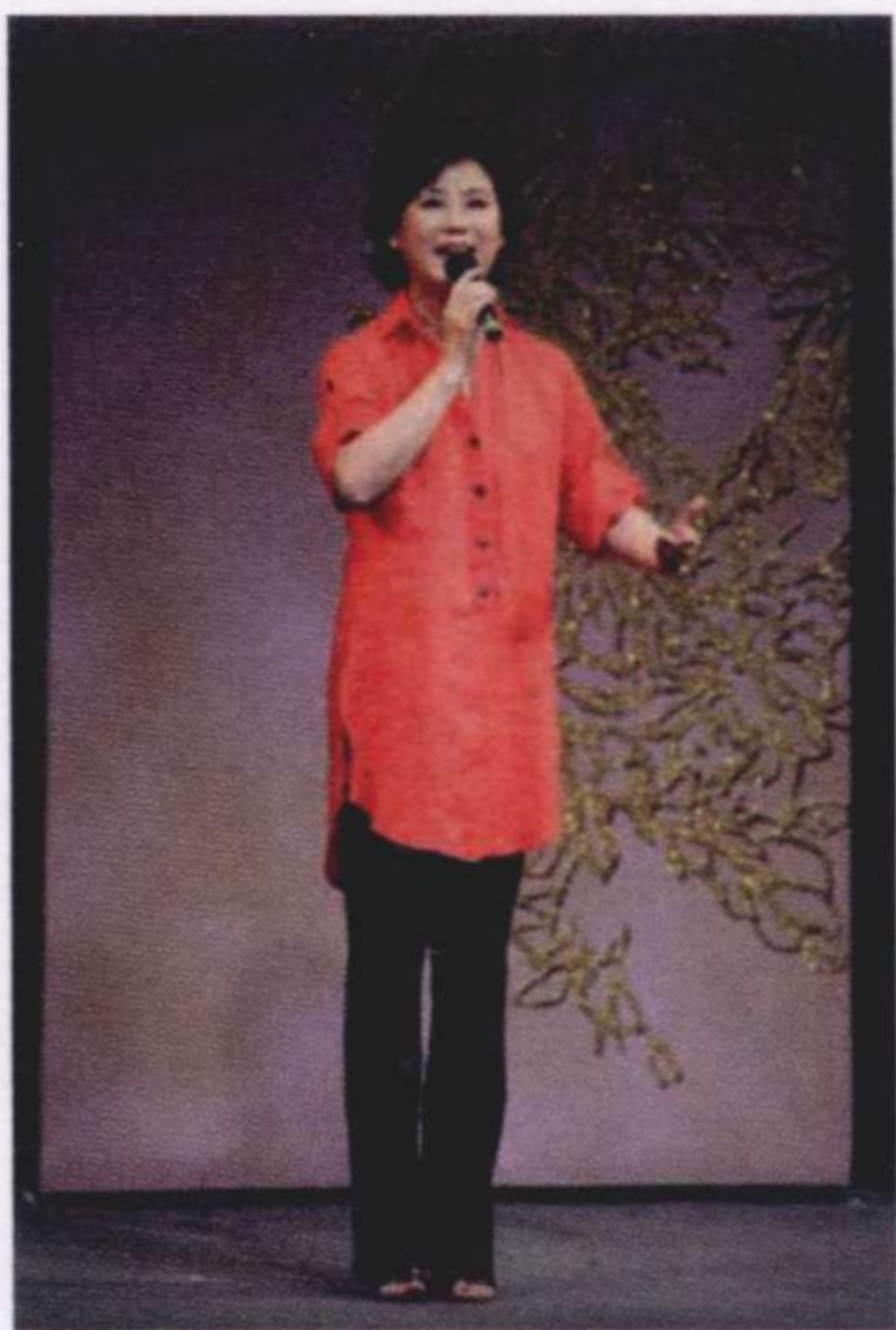
三年前，越剧明星钱惠丽约请我帮其朋友鉴定几件明清瓷器，我第一次到她的新居。那天，她同我谈及正在排越剧《韩非子》这个戏。我听了有点纳闷，越剧演的大都是才子佳人，而韩非是战国时代的杰出人物，反映这样的历史事件并非越剧的长处。见我疑惑，钱惠丽笑道：

“如演一些已被观众认可的‘公子哥儿’角色，驾轻就熟。塑造韩非这样一个才华横溢却又命运多舛的政治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想在艺术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钱惠丽，是从离我老家江藻镇钱池村不远的小山村里走进大上海的，应该是钱氏宗亲。我们同属吴越钱王之后。对她的表演艺术我很欣赏，我答应届时一定会去观赏。因此，接她短信后，我马上掉转车头，直奔剧场。

舞台上青光闪烁，悠扬的旋律响起，一排排写着篆文的竹简呈现，仿佛时空的隧道打开：在秦国统一六国前夕的历史大变局中，韩非有绝世奇才，一身傲骨，对故国充满忧患，却不被本国君王赏识；与宁阳公主相知、相爱，却不能结合；与秦王惺惺相惜，却又志同道不合。在种种矛盾冲突中，钱惠丽将其表演得淋漓尽致、气势磅礴。特别是与秦王话别这出戏，场面壮观：韩非脱掉青衫，一身洁



钱惠丽近影



钱惠丽在演出

白的服饰，光彩照人。他怒斥秦王诛戮韩国八千俘虏的暴政，字字珠玑。他维护自己的理想尊严，决不愿做秦王的忠实犬狗，句句铿锵，彰显中华一代文化巨匠韩非的真诚、真情、真性的高贵人格，达到了诗意与豪迈、婉约与荡气相交织，人情与法度、理智和激情相汇融。钱惠丽演唱收放自如、唱腔清亮、动作潇洒、声情并茂，富于书卷气和阳刚气。她的表演摆脱了《红楼梦》里贾宝玉形象的束缚，兼收并蓄、博览广取、富有新意。

有人认为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国出了两个圣人：一位是孔子，孔子及其儒家思想被历代帝王将相所尊奉，以仁礼为德纲，是人们正面所推崇的圣人；而另一位则是韩非，《韩非子》中的治国方略，即法、术、势三条，是历代君王独裁统治的理论与实战基础。韩非为人正直、勤学不怠，他的老师荀子感叹：“帝王之术非韩非不能大，法家之思非韩非不能广”。秦始皇用韩非的思想统一六国、兼并天下，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这样的一位历史人物居然被成功地搬上越剧舞台，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我想，这大概同钱惠丽的性格有点关系。诸暨人的骨气、硬气、爽气，另带三分侠气，闻名江浙。县志记载此地“俗尚刚果”“民性质直”，这里的人口快心直，属于那种吃软不吃硬的性格。诸暨名人西施、王冕、杨维禎、陈洪绶……哪个不是敢作敢为者，从小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钱惠丽自然会耳濡目染。她如今被诸暨市人民政府聘为诸暨人的形象大使，我看也挺适合的。

坐在我身旁的徐玉兰老师，十分专注地看着高徒精彩的表演，还不时拿出望远镜仔细观察其表情动作。演出结束时，87岁的徐玉兰老师告诉我，惠丽为排这出戏费时8年，花了大量的心血。《韩非子》突破传统，在越剧反映重大历史题材方面有了创新；惠丽对韩非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性格处理得恰到好处，唱腔上也进行了大胆探索，表演非常成功。我想，钱惠丽听了恩师发自内心的这番话，一定会很欣慰的。

2008年4月3日



钱惠丽饰韩非

江藻乡贤钱治辉



作者与钱煦院士(中)、钱治辉宗亲留影



2012年清明，钱氏后裔祭祖场景，右二为钱治辉

乡贤是指品德、学才为乡人推崇敬重的人。钱治辉是一位有责任心、事业心和博爱之心的企业家，被故乡江藻人称之为乡贤。他1965年出生于越国古都、西施故里的诸暨江藻杜月坞自然村。家乡山清水秀、物产富饶，加上这里历史悠久、民风淳厚，名人辈出。诸暨“耕读传家”人文背景对他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认识钱治辉时间不长，记得在2011年春节，我应江藻村书记伟苗宗兄之邀，商议村里钱氏宗祠的修复事宜，

中午，伟苗招待我们到他家吃饭，此时结识了钱治辉。他身材高挑清瘦，皮肤微黑，双目炯炯有神。他的话语不多，静静听别人说话，但他身上带着真诚与热情，

自信写在他脸庞上，还拥有几分深沉，看得出他是经过历练的人。

尔后断断续续听到关于他的故事，我的一位堂姐叫钱珠红，嫁到杜月坞村，成为钱治辉的嫂嫂。珠红姐是诸暨传统的女性，热情、耿直、勤劳、贤惠。儿时回乡省亲，她那时尚未出嫁，总可以看到她里里外外忙碌的身影，几乎一刻都不闲，从无怨言。我的父亲常常夸她的为人和勤快。她与我见面时总要夸赞小叔治辉的贤能。

钱治辉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人，17岁那年，家里兄弟多，迫于生计，决计只身一人，辍学外出谋生。他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闯荡江湖。他饱经磨难、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开拓创新、艰苦奋斗、开办实业，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实业家。

钱治辉勤勉自律、办事认真、讲究信用、事业性强，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为各地的经济发展作出自己的努力，在行业中赢得了较好的口碑。他现为青海省格尔木市政协委员、青海省工商联委、青海浙江商会副会长、中国珠宝协会理事、青海中航玉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贵州中航玉丰宝玉石有



钱治辉（右一）为江藻雁宿湖碑揭幕



作者与堂姐钱珠美（左一）钱珠红（右二）堂妹钱珠钗（右一）在双安碑前

限公司总经理、贵州满堂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中航玉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理事长等。

2015年正月初五，江藻镇政府举行银江村钱氏祠堂重修启动仪式暨西施塘石碑揭幕仪式，同时镇里还举行雁宿湖石碑落成仪式。我与钱治辉再次会面，他的事业越做越大，声望也越来越高，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我们一同为江藻镇的雁宿湖石碑揭幕。尔后第三天《诸暨日报》头版头条以《江藻镇乡贤文化激发经济发展新能量》为题，报道这项盛事，其中有一段文字与他有关：“江藻镇人自古有爱乡情结，也流传着许多故事。钱治辉就是其中的一位。事业有成后，钱治辉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支援家乡建设，成立‘治辉助学基金’，为家乡村民的各类捐款已是不计其数。2013年，钱治辉注册6000万元的玉丰玉文化产业园项目落户江藻，预计2016年底竣工，2017年开张。他对记者说：‘我这几年在外创业取得的一点成绩，离不开家乡父老对我的帮助。现在我有了一点能力，也应该回报给乡里。’”

钱治辉先生热爱乡里、乐善好施、豁达大度，关心支持家乡建设，关注社会公益事业。每年春节回家探亲，他总会到村民家里坐坐，了解村民最想解决的实际问题。每当村民说到路难走、水难喝时，钱治辉的心就会隐隐作痛。他的脑海

里就会回想起小时候那条坑坑洼洼的山路，每到下雨天总会有老人和小孩因路滑而摔倒，住在半山上的村民，天不亮就要长途跋涉下山抬水喝。于是，2010年，他出资5万元为杜月坞村修条水泥路，为村水库改造和村自来水工程捐资62万元，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改变了村里路难行、水难喝的局面。2011年诸暨遭受水灾他捐资106万元。据江藻村家谱编纂总编钱永汉介绍，当年钱治辉拿出了30万元捐助村里做家谱，又慷慨出资300万元重修钱氏宗祠，这两项大工程为2014年江藻村创建省级文化大礼堂打下了基础。同时他还热心资助各地的希望学校等。他用实际行动践行《钱氏家训》：“家富提携宗族，置义塾与公田，岁饥赈济亲朋，筹仁浆与义粟。”

每年过年期间，江藻村堂里都会热热闹闹地上演几场绍剧或越剧，普通老百姓没有精力和时间进城看戏，钱治辉就出钱将戏台搭到了村里。村民说，以前村民没事做就喜欢打牌搓麻将，现在大家都赶来看戏，文明和谐的村风也在逐步形成。这是钱治辉为家乡奉上的戏剧文化大餐。

钱治辉作为唐五代吴越国钱武肃王第三十八世孙，追终慎远、恪守祖训：“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祖宗虽远，祭祀宜诚。”他主动捐赠临安钱王陵贡桌、蜡烛台等，弘扬祖德，堪称同宗楷模。2012年清明节，我与他应临安市政协之邀请，荣任钱武肃王诞辰1160周年的主祭，与美国科学院、工程院、医学院、艺术暨自然科学院院士及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钱煦，“科技三钱”钱学森之子钱永刚，钱三强之子钱思进，钱伟长之子钱元凯等宗亲共上清香，告慰先祖，享受殊荣。

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乡贤文化的传承思想源远流长。在古老悠久的农耕文明中，乡贤在维持乡土社会有效运转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蕴含着传统乡村治理的智慧与经验。当年钱治辉从乡村走出，如今事业有成、荣归故里，用其所长反哺桑梓，在建设美丽乡村中出份力，是当地百姓值得推崇的乡贤。

2015年3月1日

周全新与元新州古城



周全新近影

诸暨乡贤周全新曾经当过诸暨市副市长，后下海经商成为优秀的企业家。我与周先生相识于今年1月在杭州召开的诸暨商会西湖分会成立大会。那天，我应邀在会上作关于西施文化与诸暨人性格形成的演讲，演讲后与周先生进行了交流。热情、沉稳，是周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尔后断断续续听到了有关他的各种评价，对他的认识变得丰满而具体起来。

周全新是浙江蓝丰控股集团董事长，杭州市诸暨商会会长，还是一位热心的慈善家，他在家乡投入的慈善资金已超过1000万元。捐资建造村文化中心大楼，让老少村民有了一个进行文体活动的漂亮场所；建造自来水塔，解决了村民的饮用水问题；建造公园，使村容村貌有了大改观；敬老爱民，每年春节回家都给村里每个老人发1000元红包……周全新的赤子之心，受到乡里人的赞赏。日前，他发起成立杭州诸商慈善基金会，致力于商会企业诚信自律建设，倡导赈灾帮困、结对助学、救济布施、回报桑梓等。反哺公益，善行天下，帮助别人，快乐自己，是周全新的崇高境界和人生追求。最近，他正积极为家乡安华元末新州古城遗址的保护之事奔走操劳。

听说我是田野考古学者，在杭州交谈时，他特意说起自己的家乡新州有明代古城墙、护城河，还有不少民间传说。这引起我的关注。没想到家乡诸暨还有明代古城墙，这可是很重要的考古信息，我想去看个究竟。

乙未清明回家乡上坟后，我应江藻镇党委书记田海斌之邀，为西施塘、雁宿湖等文化遗存石碑揭幕，顺便商议了雁宿湖的改造方案。尔后江藻乡亲柴汉峰、王执华驾车送我到新州古城。周全新陪同我考察了这里世代相传的明代古城墙、护城河等遗址。

遗址所在地地形险要，两座青山之间，留出一条宽几里的坦途，在此建城等于卡住越衢南北大通道之咽喉，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古城墙，经过600多年的风雨冲刷，又被人为取土，已经残破、衰败，但城墙的走势依旧清晰可见。它高出地面不到二尺，阡陌间，城墙根露出的灰黑色基石呈长方形。周围都是老百姓种的蔬菜和农作物，考察时，有一位农妇正在城墙上收割卷心菜，我们便与

作者与周全新（右二）、王执华（右一）、徐永华（左一）考察新州古战场





周全新在杭州诸暨商会上讲活

她亲切地交谈起来。他们知道自己脚下是古城墙，但并不知道它们存在的意义和历史价值。

站在古城墙边上，我的内心有点激动。这是一段已成为废墟的古城墙，这是一段淹没在古村落里的古城墙，这是一段浸润在四季风雨中的古城墙，也许它曾经展露过峥嵘，也许它曾经保卫过村落……望着无声无息的残垣断壁，我的思绪飞得很远。它是祖先留给后世的不加修饰的最真实的文化记忆，弥足珍贵，如不加以保护，那么，它只能静悄悄地湮没在时光里。

年近花甲的周全新告诉我：“过去，古城墙有一人多高，城墙顶上一直是村民种菜的自留地。古城墙的外墙与内墙用石砖砌就，内填夯土，由于没有任何保护措施，老百姓随意将城墙上的方砖拿去建房、盖猪圈，现在除了城墙根或许还可挖得石砖外，地上的石砖已经难觅踪影，实在可惜。古人筑城墙时，挖河取土留有护城河，但被老百姓用垃圾杂物填埋后用作耕地了。村庄没有河水，等于破坏了风水，人和自然不和谐，对后代生存发展是不利的。几年前，我实在看不过去，

便出资用水泥砌了一段护城河，将它保护下来，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保护古城墙，保护护城河，这是我和周全新的共同想法。从考古学的角度讲，用此方式保留一段护城河，改变了原来的历史风貌，但从客观上讲，也因为保留了一段护城河，可以留住一点历史的回音，可以保留一点历史的记忆。

村庄的东南方有一座美丽的小花园，绿树成阴、花卉飘香，老人们悠闲地散步聊天。漫步在村头巷尾，我努力寻找着古村落的文化遗迹。在一处围墙上，有关于“新州大战”的图文解说，据说是当地人画的。看图后，我十分惊讶，原来元末著名的“新州大战”发生在诸暨，作为诸暨人的我竟全然不知。这些年，我为考古走过祖国的山山水水，但对自己的家乡却有所忽视，真是惭愧无比。一个人无论走多远，家乡都是要经常温习的经典啊！

新州古城墙、护城河与新州大战息息相关。新州大战在历史上颇有影响，朱元璋击溃了起义军张士诚的主力，为明朝三年后开国奠定了基础。古城墙应是新州大战前建筑的，离明代开国才五年，算起来，应该为元末建城更为确切。

周全新先生对家乡文化有着深刻的认同感和使命感，他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挖掘和弘扬诸暨文化的责任，并希望我就如何保护先人的遗产献计献策。我对先生说，新州古战场在诸暨，很多人都不知道，包括诸暨当地人。所以，除了用图片说明外，还应该加强宣传，并勒石刻碑，金石永年，让历史告诉未来，教育后人珍惜并自觉保护好当地的文化遗址，因为这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啊。

新州之行，仅仅停留了短短的两个小时，但收获教益颇多。让世人了解“新州大战”、了解新州古城，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拨开历史的烟尘，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元末新州古城的衰败沉浮，让人们体察到明朝开创之艰辛和不易。

据史料介绍，元末新州大战是人类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典范。今年恰逢新州大战650周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如能策划一个系列活动加以纪念，将进一步提升家乡诸暨的历史地位和文化内涵。

于是，我停下手头的其他工作，用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元新州古战场遗址碑记》：“诸暨乃越国古都，西施故里，山川秀美，人文荟萃。元末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群雄逐鹿。朱元璋起事，渡江后连克皖南、浙江等地。时诸暨为张士诚部所据。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部将胡大海攻克诸暨。尔后张士诚部又夺

诸暨，朱元璋部复得诸暨。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九月，朱元璋外甥、明开国功臣李文忠采纳部下胡琛之策，距诸全五十里筑新州城，以重兵驻守，借山势地理，扼婺越之咽喉。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张士诚部将李伯升率兵十六万攻打新州，兵败。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李伯升领兵二十万复攻新州，朱元璋部乘大雾，里外夹击，逐北数十里，斩首无数，溪水尽赤，歼灭张士诚主力。‘新州之战’为朱元璋夺取江南、建都金陵奠定基础。此役乃‘以少胜多’之范例。明初文学家宋濂在《新雨山房记》文中云：‘国初得婺时伐伪吴张氏，相持未决，兵守诸暨界上。张氏恃诸暨为藩篱，乘间出兵侵掠，两军屠戮无虚时。故诸暨被兵特甚，崇薨巨室，焚为瓦砾灰烬；竹树花石，伐断为楼橹戈砲樵薪之用。民怨其害，多避深山大谷间，弃故址而不居。过者伤之。’今年乃新州大战650周年，值此国泰民安、政通人和之际，乡贤周全新先生等倡议保护新州古城墙。特建亭立碑，以志纪念。”

写完后，我将碑记发周全新及安华镇党委书记詹雪江等人，并与他们谈了自己的设想。4月9日，周全新率团来沪商议，听取我的意见，决定除立碑外，拟在诸暨召开学术研讨会，出版《元末新州大战笔谈》专著，拍一部历史学术纪录片等。周全新一腔热情，他说，新州大战发生在自己家乡，非常自豪。如今，他正全力以赴地推动着此事的落实，希望年底前能完成计划，让其成为诸暨乃至浙江的文化盛事。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历代最爱造城墙的君主，万里长城修造得如此宏伟壮丽，显示其远虑和卓识。在冷兵器时代，高大坚固的城墙可以阻挡强敌的进犯，使江山永固。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多少古城墙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真正强大的、坚固不可摧毁的城墙是民众，是人心啊！今天，我们挖掘历史、保留遗迹，无非是让人们从这些文化遗迹中，认识自己并更好地面向未来。所以，周全新努力挖掘家乡的历史文化，将“新州古战场”打造成为诸暨除“越国故都、西施故里、三贤（王冕、杨维禎、陈洪绶）故乡”之外的第六张文化历史名片，功德无量矣。

2015年4月11日于沪上汉风东韵堂

厚道之人方斐均

厚道，简单地说就是待人诚恳、宽容，不刻薄。它与人的个性、教育、修养等有关，洋溢着中华传统美德的光芒。我喜欢与厚道人交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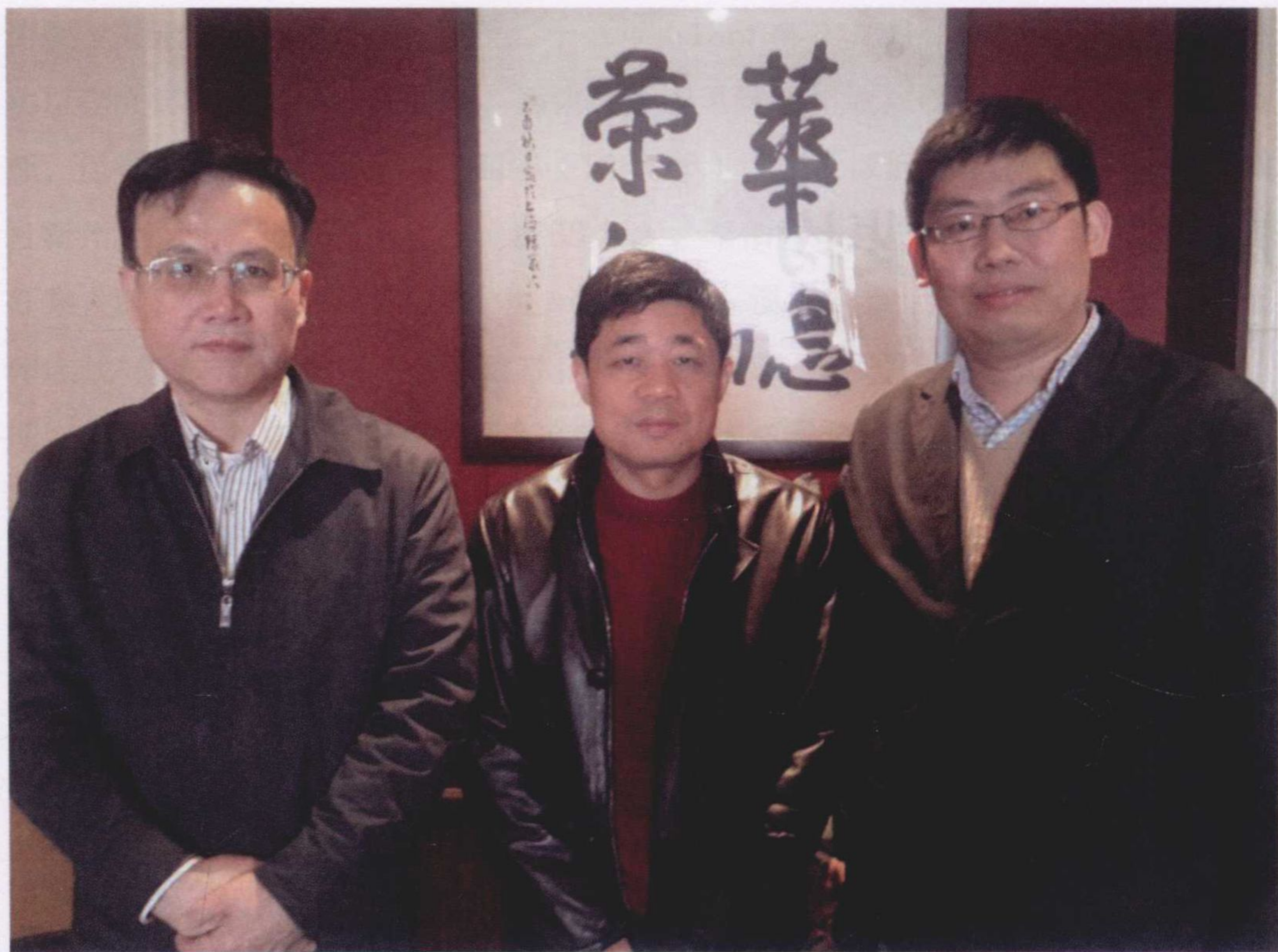
方斐均是名副其实的厚道之人。他个子不算太高，但一双眼睛炯炯有神，透露着坚毅与仁慈，性格直爽、乡音浓郁。他是诸暨人，却在上海创业，去年实现销售收入7.3亿元，光缴税就达3800万元。问起他的成功经验，他淡然地笑说：“企业要做大，关键是做人，要行孝道，积厚德。”生意之道其实也是为人之道，方斐均简短的话语，蕴涵着深刻的道理，凝聚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气、神。

乙未仲春，在松江召开的上海市诸暨商会会长联席会议上，我作为顾问应邀给乡亲作家族文化传承的演讲，会长方斐均主持了会议。在演讲即将结束时，我特意向在座的乡亲介绍了会长方斐均——

1981年，年仅18岁的方斐均，离开家乡诸暨陶朱街道山顶村，扛着蛇皮袋，独自去上海闯荡。其间，睡过地板、搬过砖头，吃了不少苦。由于他的吃苦耐劳，受到了当时主管工程的一位科员的青



方斐均在作报告



作者与方斐均（中）以及诸暨驻沪办事处主任石杰（右一）

睐，而木匠出身的他，也因此有幸在宝山区获得承包一个菜场装修的小工程。这是他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他一直铭记在心、感恩不已。自己的事业有了起色，他不忘提携亲友，20世纪90年代中期，方斐均把老家的一些亲友、同乡拉到自己的工程队里做工。其中有四五个同乡，在他的鼓励帮助下，不断努力，从小工做到了高管，甚至考取了与建筑相关的工程师证。如今，30年多过去了，方斐均已成为宝山区政协常委，上海江杰荣泰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多次被评为上海市百强私营企业，2013年获得中国建筑的最高荣誉“鲁班奖”。去年他的家庭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方斐均成了一位真正成功的企业家，他的地位变了，但“行孝道，积厚德”的传统美德不仅没有丢，还在不断地发扬光大。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亲自去拜访那些曾经给予他帮助的长者，向他们汇报自己一年的发展，感谢他们在困难时给予的帮助，还用专车接送他们到公司参加企业文化活动。受人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方斐均的敬老、厚道，以身作则，让企业员工非常感动，深受教育。方斐均认为，诚信厚道，务实创新，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

俗话说，好人有好报。方斐均深谙其道，他将做好人、做好事、创好业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能没有好报吗？

讲完方斐均的故事，在场的企业家为之鼓掌，他们由衷地庆幸上海诸暨商会由方总这样的厚道人掌舵，前程一定辉煌。由于时间关系，我在会上只讲了方斐均故事的一个开头，更精彩的还在后头——

今年初春，上海诸暨商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方斐均听说诸暨市政府为让乡村的环境得到改善，欲实施污水处理工程，但资金尚有缺口。闻讯后，方斐均牵头募集100万元善款，将代表上海诸暨商会无偿捐赠给家乡，为改善民生、造福乡里尽了一份力。他的厚道之举，得到了同仁和家乡领导的赞誉。

厚道没有固定的含义，它是一种精神体现；厚道没有固定的模式，它是一种生活认识。厚道与一个人读书多少并无直接的关系。在家乡时，方斐均读书不多，但家乡“耕读传家”的文化背景对他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了好的底子，就会有发力的基础。来沪后他虚心好学、不断进取，最后不仅取得了大学文凭，还具备了一个企业家的洞察力。厚道与实力，为他的事业发展插上飞翔的双翼。

上海已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养老将是未来的一个大问题。早在12年前，方斐均就意识到此问题的严峻性，开始认真研判“银发市场”的需求，最终认定“银发市场”将是一个朝阳产业。为此，他于2006年购置了46亩土地用于发展养老产业，现已建造5万平方米的基地，今后将根据市场需求逐渐拓展成20万平方米的大基地。理由很简单，在今后40年中，敬老院养老会为大多数老人接受，居家养老模式会转为敬老院养老。随着人的寿命不断地延长，一对小夫妻将来要照顾4个老人，或6个老人，甚至8个老人，这肯定是有难度的。无疑，方斐均是有眼光的，如今养老地产成为大家普遍看好的房产项目。



方斐均近影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方斐均具备这样的眼光，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他的厚道。他说，要对家人好一些，一个对自己小家都不好的人，怎么会对大家好？对自己的父母要孝敬一些，一个对自己父母都不孝敬的人，怎么会对社会老人孝敬？对自己企业的员工要负责任，一个对自己企业员工都不负责任的人，怎么会对国家负责任呢？古人讲：百善孝为先，很自然地，方斐均把养老地产业建设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经常和工程建设人员一起研究园林环境、室内设施等建设和设计，以期老人能在自己建造的基地安享晚年。

前不久，诸暨市市长徐良平会见方斐均，希望他回家乡办养老产业。方斐均认为，帮助诸暨人发展、反哺自己的家乡，这是每个诸暨企业家的责任。他说，诸暨青山绿水、空气优良、食品新鲜，有着独特的优势，家乡有需求，我们义不容辞。我想先把上海的养老事业做起来，积累一定的经验后，再回诸暨从事养老产业，诸暨人能放心地把父母交给我，这是对我的信任和鞭策。

方斐均在发展企业的同时，一直记挂着如何用自己的财富和行动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

他热心教育，15年前，在上海宝山区结对了10个小学生，现今这些学子全部大学毕业。

他关注社会，2008年汶川地震慷慨捐资达200万元。

他关爱乡邻，从2010年起，每年出资10万关爱基金，把这些钱分发给家乡村里的老人和困难家庭。今年准备投资100多万元，为家乡修建一条道路……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方斐均的人品和德行，都是那么打动人。他的厚道让人信赖、让人踏实、让人安心、让人感动。尽管公司和他个人获得的各种荣誉奖项不计其数，但他从不炫耀、从不居功自傲，从不把名利当成一种目的或目标去追逐。他说，保持一颗平常心，顺势而为、取之有道、得之无愧。这样的淡定让人刮目相看，正是这样的淡然，造就了他成功的必然。

“天道佑仁，为善则昌；读书明理，敬贤孝长”，这是我对方斐均的评价，并以此书写成作品相赠，我愿与厚道的乡兄方斐均共勉之。

2015年4月23日于汉风东韵堂